

The Critique of Reason and Non-reason:
The Logic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Spirit and Philosophy

理性—非理性批判

——精神和哲学的历史逻辑考察

冯玉珍 著

人民出版社

014032574

B089
132

The Critique of Reason and Non-reason :
The Logic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Spirit and Philosophy

理性——非理性批判

——精神和哲学的历史逻辑考察

冯玉珍 著



B089
132



北航

C1720762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非理性批判:精神和哲学的历史逻辑考察/冯玉珍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2933-4

I. ①理… II. ①冯… III. ①理性—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8204 号

理性—非理性批判

LIXING FEILIXING PIPAN

——精神和哲学的历史逻辑考察

冯玉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7.75

字数:460 千字

ISBN 978-7-01-012933-4 定价: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北航

C1720762

原版序言

陈先达

非理性主义是当代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它不仅存在于哲学领域,而且存在于美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并广泛渗入小说、诗歌、戏剧、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多种文学艺术形式之中。近些年,非理性主义思潮对我国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我国高校校园里一度流行的“叔本华、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就说明了这一点。有的人主张当代要“从弘扬理性、崇拜理性到反思理性”,认为“从对理性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是哲学意识的进步”。这些观点调助长了非理性主义的传播,对青年的成长起了消极的导向作用。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弄清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弄清非理性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提高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鉴别力。冯玉珍同志的专著《理性的悲哀与欢乐》,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进行了考察。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

人是一种具有理性的社会存在物。但人不仅有理性,即具有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也有非理性因素,如情欲、直觉、灵感、意志、顿悟等。但人并不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混合体。人就其主导方面说是理性的。而人的非理性因素是能够受理性支配和制约的。把人的非理性因素变成独立的、不受理性约束的本能活动,就把人降低为动物。马克思早就说过:“吃、喝、性行为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①非理性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它研究了人的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4页。

理性因素,而在于它片面强调非理性因素、否定理性因素,把非理性因素作为支配人的一切活动的“内驱力”和唯一的思维方式。

不能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简单看做是两种片面性,更不能简单地把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转变说成是哲学意识的进步。冯玉珍的专著以充分的材料说明了这一点。

在历史上,理性主义是一种进步思潮。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赞美理性、崇拜理性,把理性作为批判宗教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尊重理性必然尊重科学。在历史上理性主义曾经帮助自然科学摆脱神学的桎梏,并借助科学来宣扬知识和理性的力量。理性主义忽视了人的非理性因素,这当然是一种片面性。但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非理性主义是一种倒退的甚至反动的思潮。尽管在非理性主义思潮中派别林立,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贬低和蔑视理性,推崇人的非理性因素。例如,唯意志论者叔本华、尼采推崇的是人的意志和欲望。叔本华认为,人的理性、知识只是表面现象,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盲目的欲望和意志,理性的目的不在于理性自身,而是满足欲望的手段。尼采也极力反对理性,他激烈抨击任何肯定理性和辩证思维的哲学家,认为哲学的迷误正在于不把逻辑和理性范畴看做满足欲望的手段,而是认为在其中可以发现真理和真理的标准。生命哲学反对理性,强调直觉,认为只有直觉才是认识的唯一的方式。生命哲学所主张的生命冲动,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欲望和意志。存在主义所宣扬的个人的情绪和感受,如焦虑、绝望、恐惧、孤独等,也是一种不能为理性所把握的个人主观体验,是一种不受理性支配的非理性因素。泛性主义者弗洛伊德把人的性本能和性冲动作为原始的内驱力置于人的意识之上,也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表现。

人的确有非理性因素,应该研究。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以往被忽视的非理性因素方面来,客观上推动了人们对非理性因素在人的实践和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这对于哲学、美学、文学艺术都是有意义的。但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的兴起并不是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更不是哲学意识的进步,而是一种倒退,因为它反对理性、反对科学、反对进步,主张神秘主义、信仰主义、悲观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社会思潮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是分不开的,它是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矛盾困扰的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们,对于自己的前途和社会发展前景丧失信心的

曲折反映。卢卡奇在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理性的毁灭》一书中,着重考察了德国哲学由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转变,认为“非理性主义是对人类思维辩证发展的一种纯粹反动形式”,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转变,“属于德国历史最耻辱的一页”。

非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并不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14世纪开始的人文主义,经过法国启蒙主义到德国古典哲学,它的重要特点是理性主义。而从叔本华、尼采开始,逐步转向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动。在当代,非理性主义的对立面是马克思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直接或间接、隐蔽或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不可能依靠理性主义来批判非理性主义,而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是两种世界观、两种历史观的对立,核心问题是对人和人的本质的根本不同看法。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本质是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无论是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都是当今西方人本主义的各种流派。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否认人的社会性,把孤立的、作为生物学个体的人当做出发点,把意志、欲望、生命冲动、直觉、情绪、爱欲这些非理性因素作为人的本质,把人之外的客观世界,作为人的意志、欲望、直觉等的表现,实际上是否认世界的物质性,把人的非理性因素当做世界的本体。

这种出发点的错误,导致一系列错误:第一,在自然观上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和规律性,把物质世界看成是杂乱的、不可理解的非理性世界。第二,在历史观上否认社会发展规律,把社会历史看成是意志、欲望或生命的冲动。否认人民群众的作用,鼓吹个人特别是超人的决定作用。第三,在认识论上否认理性和逻辑力量,片面强调非理性因素,诸如直觉、顿悟、信仰的作用。第四,在人生观上宣传极端个人主义和非观厌世主义。第五,在伦理学上宣传非道德主义。

非理性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特别由于非理性主义思潮往往同文学艺术相结合,更具有影响力和渗透力。在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不能忽视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特征及其危害的分析,提高青年的识别力。对非理性主义的批判,一定要深入了解青年们的思想状况,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把

哲学研究和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但是不能就事论事,一定要从哲学层次即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高度去阐述问题。其中特别是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对青年的成长尤为重要。我们一定要引导青年分析和批判非理性主义宣扬的各种错误的人生态度和非道德倾向,反对极端的利己主义、反对民族虚无主义。

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理性和非理性主义,涉及许多领域。特别是对人类早期的研究,由于材料的缺乏和观点的分歧,更是不易。要概括人类全部精神发展史,给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说明,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达到的,也不是一本书所能解决的。但冯玉珍的专著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她下了很大工夫,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91年12月

对原版书的评论意见

刘放桐

我认为冯玉珍同志的《理性的悲哀与欢乐》一书是近年来我国出版的大量哲学书籍中少数几本最有学术价值的专著之一。其理由如下：

第一，本书根据历史和逻辑的考察，对理性和非理性各自的特性，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其在哲学上的意义，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刻的分析。我国哲学界谈论理性的著作并不鲜见，但深层的研究不多，至于对非理性往往只是作为个别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的观点偶尔提及，或者作为心理学的内容予以介绍，似乎还没有见过对西方哲学史上非理性问题的系统研究的著作。从这一角度说，冯玉珍同志这本书具有开拓性意义。第二，本书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及其与理性主义的关系作了相当深入和具体的探索。这方面的问题在国内外都是哲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在国外，如何看待英美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大陆形而上学、人文哲学（特别是非理性主义）的关系，近几十年来一直为许多著名哲学家所关注，虽已有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出版，但至今尚无权威性的著作问世。我国哲学界近些年来也已有一些哲学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就我所知，大都停留于一般性的评论，缺乏理论深度，或者只是论及个别哲学家或学派，未能将其放在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大背景下作系统深入的分析。冯玉珍同志这本著作正是参与这个“热点”和困难问题的。她所作的研究也许还不能说是成熟的，但与国内现有的那些有关这方面的论著相比，要高明得多。此外，本书还有两个重要的优点：一是材料扎实。作者对西方理性和非理性、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所作的考察都以丰富的历史材料为根据，表现出作者对西方哲学和文化有相当坚实的知识。二是作者对自己的观点的表达能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本书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摆脱了传统的僵化观念的束缚,很有新意。但作者不是简单论断,而是作到有根有据,成一家之言。这一点正是学术研究中值得提倡的。

1993 年 12 月 17 日

新版序言

当人的个体是一个独立人格的思想主体,心怀向善的虔诚深思熟虑这个世界有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人类面临的种种生存危机包括生态环境恶化的窘境,并企盼再一次摆脱无尽的、已经历的危机重迎光明到来时,思想的迷茫、冷静或反思是同时的。

这种种危象究竟孰之过?原因在哪里?是内在的精神、思想、灵魂还是经济、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或是政治、军事之故还是伦理、宗教、科学、教育之故?抑或说,是这些交叠原因的综合之过?

人们现在处的,既是人类史上光辉灿烂的文明文化和科学发达极致时代,也是精神、文化或灵魂最贫乏的时代。如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兴盛、衰败、腐化、灭亡周而复始的生命周期轮回一样,人类命运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的“拐弯抹角”处。因此,找到恰当的拐弯方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方向错了,一切全都背道而驰了。在这种情况下,所付出的代价越高,牺牲的也就越多,人民就会不堪重负而怨声载道,甚至社会就会陷于不安或动荡……这似乎是全世界的生存共相;无论哪一个民族或国家基于自己民族文化个性和现实都几乎在所难逃。

这又是一个精神文化极度膨胀又极其衰退的时代,是一个深陷现代主义危机又深刻反省现代主义的时代。二百多年前黑格尔对时代精神或哲学危机的睿智分析,恰是我们这个世界性、全球性、人类化当代所需求的精神启示:

“假如一个民族觉得它的国家法学、它的情思、它的风习和道德已变为无用时,是一件很可怪的事;那么,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当从事于探讨自己的纯粹本质的精神,已经在民族中不再真实存在时,这至少同样是很可怪的。……”

这种通俗的学说迎合了近代教育学的叫嚷,迎合了眼光只向当前需要的

时代必需;这就是说,正如经验对于知识是首要的,而理论的洞见对于公私生活中的干练精明,则甚至是有害的,实际练习和实用的教养,才是基本的、唯一要得的——科学和常识这样携手协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崩溃,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即,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空空荡荡。”^①

因此,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情欲无度、权力膨胀及与之相随相伴的精神倒塌、理性衰败、道德沦丧、哲学被毁、灵魂几近失却的时代,凡精神灵魂犹存、哲学矢志不失的仁人志士能为哲学的复兴尽力。中华民族的哲学复兴就是民族精神的复兴,进而才有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或“梦”。这就需要一种被现代主义科技主义的狭隘思维方式或观念,长期冷落、排斥甚至蔑视的真正哲学智慧或理性思维,去拨开重重迷雾以窥视并思想那深不可测的真相或真理。这不是哲学的迷信,乃人性理性的使然。如康德所示:凡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对于理论是有效的,对于实践也就是有效的。于是,就有了对于精神的追求与探索,就有了这本《理性—非理性批判》的文字或语言。

这是一种精神的劳作和耕耘,播下的是精神,收获的还是精神。精神的运动是逻辑的运动;然而逻辑是什么?黑格尔说,逻辑无法预先说出,只有逻辑的全部研究才会知道逻辑本身是什么这一点,摆出来作为它的结果和完成。

所以,基于精神的理性—非理性的历史和逻辑考察之哲学文字,或者说,揭示精神理性—非理性与外在哲学形式的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内在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的逻辑,需要在阅读中自见其分晓。

一、现代主义精神启蒙及其反 现代化运动的文化批判

这里的精神,不是黑格尔式精神,是人类生命个体与全物种须臾不可分的性灵或灵魂之精神,是人类创造对象世界的理智精神与生命欲望同一。人类因这大自然秉赋实现自我超越、创造、发展,遂使人类这一物种有羞耻感、伦理与道德,进而形成共同体、社会、国家,同时也就始有文化、法规、文明,从而与

^①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2页。

动物划界；成为既有伦理道德又有法律规范的文化性人类。文化、符号、关系、体制，以及以文化形式显现的思想、观念、主义、学说等，体现人类精神载体的又一种“他人心理”的不同文化符号形成。这是精神自己认识自己、返回自己、否定自己、创造自己发展的不尽历史与显现的逻辑。

理性—非理性批判，即是基于精神与哲学关系的分析考察这是源自对人类精神奥秘的兴趣，源自哲学对宇宙的惊异和对人生奥秘的求解热忱，源自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世界发现和人的发现，那从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枷锁中的解放，以人取代神，以世俗或现实生活取代来世或天国神学观念欺骗的觉醒。尔后经过近代培根、笛卡尔的经验哲学和理性哲学对宗教哲学从思想中的摧毁，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奠基。特别是卢梭社会契约论及其人权思想与休谟的怀疑论，触动了康德。休谟成为康德心灵中的牛顿，卢梭成为康德心灵中的苏格拉底，在关注头上星空的奥妙时，更要关注心中的道德律。这样自然律和道德律，或说因果律与自由律，就在康德先验理性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以及将前二者贯通的审美判断力领域，建立起他睥睨古人、下开百代思想的批判新哲学。

康德哲学还包括其历史理性思想，是纯粹理性在历史领域贯彻和展开。在此，他企求为人类寻找一个“一群人生活在法律规范之下的共同体”社会理想。因为，共同体或国家既可以成为每个公民自由平等生存体制，也可以成为霍布斯所谓的“人与人像狼一样”的相互压迫无法律的野蛮体制。所以康德认为，“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而正义和真理、自由和平等、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是历史理性原则及其历史活动最高宗旨。

因为唯有在法治公民社会里，才能以法调节和保障各个公民自由平等权利，使人这种既具有利己化倾向，又具有社会化倾向展示自己能力的物种，在宪法指引制约下，化对抗为动力；使各个个人平等、权利、义务互不侵犯。“唯有在一个具有高度的自由，因之它的成员之间也就具有彻底的对抗性，但同时这种自由的界限却又具有最精确的规定和保证，从而这一自由便可以与别人的自由共存共处的社会里；——唯有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大自然的最高目标，亦即她那全部秉赋的发展，才能在人类的身上得到实现。……因而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

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那也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①

所以,人的利己性倾向和社会性倾向的内在矛盾或对抗,构成人性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内在动力。康德对人性内在性或精神内在性矛盾表述,在其哲学不同时期是有差异的:在实践理性和判断力批判中他将人性矛盾或对抗表述为,立于自然之下原生命欲望、意志、情感之非理性,和立于理性意志或自由意志之下道德伦理之理性;在其哲学观转向社会历史批判领域后则表述为非社会性或利己性与社会性或公共性矛盾或对抗性了。显然康德是从人性或精神内在性矛盾或对抗,揭示社会历史进化深层原因的。在这里,人性和精神是同等程度概念,应用对象不同,表述异样。

在康德看来,人类天性喜欢自由,然而,无法律自由是可怕的。无法律自由就像社会偶然性情况下的野蛮状态,是恐怖或灾难的,如暴政及其屠杀。所以,为保障人人自由权利,必须有一种不可抗拒权力的调节、制衡,这就是人群组织的共同体、社会或国家。利用社会或国家共同体力量以外在法律形式加于社会和公民,使权力和自由处于最大限度结合是个极其重要问题。然而对权力本身也必须制衡,这就需要一个完全正义的宪法才能实现。唯有正义的宪法,才能使共同体或国家权力在宪法之下调节每个人自由之行为,使每个人之间的自由和权利互不侵犯,和谐相处;同时也避免权力本身异化成为假借“自由”名义,实际对自由亵渎和侵犯的恶行。而普遍法治公民社会和完整正义公民宪法,是人性高度发展完善或高度的文化进化目标的基础。

康德认为,既往历史杂乱无章是由于未认识历史的普遍理性,或者说未洞察到深藏于人性深处的人性矛盾及其发现解决人性矛盾的方法、途径,从而使人类历史行为陷入盲目、愚蠢、虚伪和罪恶中而未觉。现在通过人类历史行为或历史现象揭示的历史普遍理性及其应用或实践,产生在社会中人与人群行为与权利的立法,就像道德领域绝对命令的有效性,在历史社会领域以法制约、规范人之行为,化解人性对抗和社会关系矛盾,将对抗转化为人性和社会进步动力。使政治或法权原则与社会、公民伦理道德结合,通过普遍文化教育或教化,转化成普遍法治的公民意识和法治的社会,使人类的历史意识及其行

^①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9页。

为从愚蠢、虚荣、罪恶中解脱出来,追求完善或至善。幸福虽然是人人要追求的,然而人和人类生存目的不只是幸福一维;更重要的是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认识能力,发展自觉自由道德观念,从而显现人的意志自由、道德自律、人之为人的尊严和力量;这是外在法权的内在伦理基础,从而构成人类自我超越、发展动力。因为万物存在意义就是发展和完善自己,人类及其历史也不例外。他认为,高度的文化是人类、历史进化的目标,是大自然赋予人类历史理性能力,是人性高度发展和人的外在法权与内在道德完美同一的高度文明生存状态。

所以,世界著名史学家柯林武德说:康德“以启蒙运动的真正风格,把以往的历史看做是人类非理性的一幕并期待着一种理性生活的乌托邦。在他的身上真正值得瞩目的是,他把启蒙运动的观点和浪漫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的那种方式,很像是在他的认识论中他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起来那样。”^①显然,康德的社会历史理想并非是乌托邦,柯林武德并非真正理解康德。因为康德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立法,已不是纯粹意志自由的道德律令了;而是“凡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对于理论是有效的,对于实践也就是有效的”历史社会法则判断的。这一判断是纯粹理性的,又是实践必须如是的,正像人的生死法则一样是纯粹理性与经验同一的思想法则。

康德在其思想后期转入社会历史领域后,他对人性的社会历史性思考,对人性的法权性或政治性思考,基于人性的自由、平等、独立原则的个人权利,以及社会、国家或公共权利及其关系的深刻思考,提出了国家权利、国际权利、世界公民权利,以及世界“永久和平论”实现的条件和保障等,是人类及其社会历史进化与进步的思想珍宝。他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永久和平论》等著述,即是他最后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继续追寻和回答“人是什么?”的哲学最终问题。通过社会历史领域揭示了,人不仅是理性、认知、道德的;同时是社会、法权(权利与义务同一)、政治的;因为人性理性的意志自由和道德自律的有效性,是以一个普遍法治环境或社会制度为前提或保障的;只有个人同时是社会法权或政治性公民时,这个人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或者说,作为公民,不仅有道德义务和权利,同时具有法权或政治权利和义务,即

①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根源于人性天赋人权参与公共事务或政治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决定了公民有权利和义务选择自己生存的社会制度的自由。在这里康德奠定了社会共同体或国家体制或制度优先个人道德品质的思想。康德认为,一方面,只有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制度或体制,个人意志自由的道德律才能普遍和有效;另一方面,良好的或法治公民体制可以使不良者转化为良善者,即环境或制度决定人是什么样的。所以康德说,即使是一个魔鬼民族只要有了法制和法治(只要他们有建立法治的理智),也可以建立起一个国家并可以有秩序地生活。康德由此考察了人类世界中的战争与和平人性根源,以及永久和平世界实现理想或哲学规划,或“那一个甜密的梦”。

其实康德这一“永久和平”规划,不是一个梦。如前述,因为这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和实践的。人类世界的现当代活动证实了康德的理性预言。因为既然人性权利及其要求与对抗构成国内战争与国家间战争根源,因此,唯有法律可以调节或保障各个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与其他国权利的冲突而和平共处。所以,人与人和国家与国家其关系的奥秘就是:法律的状态是和平状态;无法律的状态是战争状态。20世纪人类进行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60多年过去了,虽然局部战争不断,但是始终未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间隔时间,充分证实了依靠国际公法和每一个国家法治理念和经验进行谈判和沟通,各个具体权利关系通过法律调节处于公平正义关系中,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是人类与人性的进步。所以,康德是对的。基于人性矛盾或对抗原因,由法律调节或制约个人或人类权利正义关系,是可以实现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间的权利对抗的和解的。由于康德认为大自然赋予人的人性是基于整个人类这一物种而不是基于个人,因此个人或个体同时也是世界性的个人,由此产生世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及由此生成的国际共同体及其法律。康德思想后期的历史理性批判及由此形成的,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普遍法的公民社会以及“永久和平论”这一困扰人类当代最重大理论与实践或现实问题,康德均予以理性或哲学回答。

无疑,康德的理性启蒙思想,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工业化民族的中国,是有启迪意义的。既然现代化源自欧洲,源自欧洲启蒙时代精神及其思想,并且获得了基本成功,虽然其消极面受到各方面,特别反现代化思潮、社会主义思潮

和后现代主义批判,但现代化毕竟是人类进步历史创举和历史进步活动;有着深远历史根源和发展潜力。因此,促成现代化成功的启蒙时代精神及其启蒙思想,是有重要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的。

那么什么是启蒙,如何实行启蒙?就看各个民族和国家具体情况以及所处时代背景如何了。康德写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①观察与考察历史和现实,在人类或人们生活中,究竟在什么时候或条件下、有多少人能够自觉运用自己的理智呢?“文革”是亿万中国人参与的运动,后来被否定了。此证明我们民族曾经有过“集体无意识”非理性历史行为记录;揭示了我们民族及其思想文化,空缺这一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我教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文革”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断而陷于十年动乱,其负面影响潜伏历史深处,乃至祸患无穷殃及子孙后代。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从理性或哲学高度进行认真反思,没有系统反思我们的历史思想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甚至可能还会酿出从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出发“重来文革”的主张。这可能是一种出于对当前腐败不满的激愤情感的语言,是想“以恶制恶”,而没有从根本上思考以宪法治国的理性出路。

所以,反思历史也是一种思想启蒙。对历史无反思,无认识,就会重蹈历史覆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百废待兴时刻,有远见的德国高层决策者便强调首当其冲的要务是重印《康德全集》。因为他们明白,只有重振康德的哲学理性精神,才能重振和建设民族精神,才能医治民族精神创伤。康德的故乡——柯尼斯堡,这座悠久的欧洲历史名城或世界贸易城市,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诞生地。可150年后却成为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最后与同盟国决战被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击败的坟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印《康德全集》真是历史意义深远。既是历史和人类的自我讥讽,又是人类人性的再次觉醒:以和平或法律的方式解决权利的矛盾或对抗,永久和平就不是乌托邦。因为

①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页。

哲学不能改变世界,却能改变人,而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灵魂,是时代精神内容本质,是一切外在力量的思想源泉和动力。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与其极重哲学精神建设密不可分的。

康德哲学作为现代哲学标志和启蒙时代精神灵魂,其思想影响早已超越欧洲成为全人类思想财富;是追求工业现代化的民族和国家必不可缺失的精神食粮。因为现代化不局限于经济和外在的各种形式的物质享有或享受;而使现代化健康发展并生根恒久的,是一个民族精神生命或灵魂健全,科学思维方式、公民意识普遍确立或生成。或者说,只有思想意识现代化,思维方式现代化,才能使人本身或主体意识现代化,这是现代化能动性根本。而一个民族要登上科学思维高峰,除了学习哲学外,没有别的捷径。因为哲学是思维的,而每个具有健全头脑的人是思维的;这是使人具有健全灵魂的前提。

现代与后现代没有严格界限,不同学者也有不同认定标准。大致说来,通过欧洲 16 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运动,至 18 世纪以康德为标志的再次欧洲启蒙思想运动,是现代主义思想和时代肇始标志,人类社会历史从农业文明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或现代主义时代或现代化工业浪潮的世界性跨越始端。现代主义既是一种思想或理论标识,也是一种社会历史活动或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活动方式标志,是人类历史必然必须跨入的历史阶段。自 19 世纪中叶前后欧洲和北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代)以及东方的日本,至 20 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根据一般理论共识或传统现代化识见,基本应归属现代主义或世界现代工业化历史阶段。1968 年在中国文革影响下的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运动后,可算进入后现代工业或后现代主义历史阶段。当然这种区分也是相对的,因为伴随着世界现代工业化浪潮或现代主义运动,实际上就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运动。反现代化运动也可谓后现代主义运动之一种,是一个历史与现实内容复杂、形式和动机多样性思想文化批判运动。《资本论》就是反现代化运动的理论之一,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内,构成反现代化运动早期理论。这些反现代化运动主要是反对利用生产关系私有占有方式剥削压迫劳动者,而不是反对生产方式本身。既是反现代化的文化诉求,同时也是政治诉求。后现代主义仍是现代主义内容一部分或时代转身,不是现代主义终结。现代化与反现代化运动几乎并行不悖,